

## 【新书快评】

“小皇帝”，这是一个批评性的字眼，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为此还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中国的小皇帝》。所谓“小皇帝”，特指独生子女们。他们被认为过于娇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是缺乏家教的一代人。然而，为什么家长们都知道“小皇帝”不好，却不加以约束呢？中国的教育传统向来反对娇惯孩子，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社会相对贫穷，为何会冒出这么一代人？有多少人真正对此进行过深入调查？

于是，一位名叫冯文的美籍华裔学者为完成博士论文，来到中国大连。整整两年，冯文在课余时间用免费教英语的方式，深入了一个个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的父母双下岗，也有不少算是富户。当父母与孩子交流时，冯文会记录下双方的对话，人们感到惊讶，但不久便习以为常了。扎实的一线调查汇成《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其说它是学术著作，不如说它是一本生动的历史记录。它忠实地展现了两代中国人的惶惑、奋斗与牺牲。它如此客观，所以震撼人心。

该书所反映的是20年前的中国，如今“小皇帝”已走进历史，很少再被提起，但本书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与未来，仍有借鉴价值。

# “小皇帝”们是“垮掉的一代”吗

□唐山

1997年冯文来中国时，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已进入中学，并被称为“小皇帝”。

对老一代来说，接受普及教育已足够，因为成绩对他们今后发展的影响有限，所以功课压力不大。独生子女一代则不同，他们是父母的唯一希望，想走进精英阶层，必须靠更高的学历。然而，随着高学历者增多，学历也出现了通胀，孩子们只能争取更高的学历，这就变成一个互相推涨、互相追逐的游戏。

独生子女功课沉重，远超老一代，从一出生开始，他们便被动进入到残酷竞争中。严酷竞争抹煞了生命成长必须的过程，孩子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忍受枯燥、缺乏自由的生活。

其实，家长们同样不明白，他们只能看别人怎么做，来制定自己的竞争策略。看其他家长带孩子上补习班，给孩子请家庭教师，他们也纷纷跟进。家长与孩子都感到恐慌，亲情成了缓和情绪的唯一港湾，可在巨大压力下，这个港湾也不再可靠。

冯文忠实地记录下许多虐心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正上初中的孙薇（化名）来自贫困家庭，母亲下岗，父亲亦即将下岗，可她却和同学谈起早恋。同学逛街时轮流借钱请大家吃饭，孙薇只能买最便宜的（冰棍和饮料），这笔花销给家庭带来负担。母亲抱怨说：“你就不能从家里带点白开水吗？”孙薇的回答是：“那不行！你去了就要请客。我的朋友老请我吃饭的饭，我起码也要请人家吃冰棍吧。”

为获得名牌球鞋，孙薇向母亲要钱，母亲说只要下次能考进

全班前十名，就满足她的要求，但孙薇抗议说，那时鞋已被别人买走了。最终母亲给了她钱，孙薇喊道：“妈妈我爱你！”

孙薇的母亲有高血压，医生要她立即住院，但孙薇即将中考，她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她说：“我不能在她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离开她。”

刚考完，母亲就住院了。孙薇后来上了一所中专，她感到深深的忏悔，成为一名刻苦的学生，想通过成人高考拿到大学文凭。在母亲看来：孙薇以前“不懂事”，现在她终于“长大了”。

孙薇的故事带有普遍性。它有喜剧的一面——孩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但也有悲剧的一面——孙薇本不应这么早就体会到尘世艰难，她成人后，也许比自己的母亲更严厉。

在今天，发达国家的孩子们同样挑战权威、个性独立、追逐品牌、不爱干家务……与他们相比，中国孩子们毫不过分。只是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更多资源集中到孩子身上，他们过上了第一世界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只有第三世界的生活经验，落差如此惊人，很难不产生冲突。

发达国家的孩子也获得了较多资源，但只是他们父母拥有的一小部分，中国父母则将几乎全部资源都给了孩子。中国父母为何要做这么巨大的牺牲呢？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是聚族而居，他们的生命价值系于祖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要讲道德，因为祖先正在天上监督他，他死后，要去另一个世界和祖先会面，接受他们的裁判。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祖坟、祠堂等均被取消，人们告别了大家族，以小家庭的形式与陌生人聚居在单元楼中，当代中国人多数想不起爷爷的名字，很少有人能保留4代以上的家族记忆。

失去了和祖先之间的联系，必然引起价值恐慌，只能将活着的意义系于子女。想到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孩子明天变得更好时，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会感到心满意足。正如一位母亲说的：将来人们看到我的孩子，会说他这么优秀，一定有位好母亲，那样我就没白活。

不否认，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自私，但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尊严降到如此卑微的地步，又怎能忍心去指责她呢？

《唯一的希望》是一本能让读者不断流泪的学术著作，它展现出社会学的温度，即：不仅能从更高的视角俯视苍生，也能充满悲悯地关注个体生命的挣扎。对于为人父母的读者，会惊叹于作者调查的细致、深入与生动，书中的案例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感觉变得麻木。我们天天在谈论“小皇帝”，但有多少人做了同样扎实的调查？坐在办公室中，用想当然逻辑推演一番，便匆匆得出结论，所以永难超越困境。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冯文著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数十年来，《博物馆罪行记》作者行走于欧美各大博物馆与美术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聚成一部妙趣横生且增长见闻的另类西方艺术史，历史典故及奇闻逸事信手拈来，让人在轻松的阅读中丰富对西方艺术史的认知。

## 【著作者说】

# 博物馆罪行记

□顺手牵猴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第一次去纽约，赶上要过生日，于是几个早年北京的朋友，约了饭局庆生。就在生日前一天，突然接到另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刚从塔希提岛跑过来找工作。总该见一面吧，于是问她愿意去哪儿，她说第二天就是世界博物馆日，全城展馆一律免费，正好还没到过大都会，很想去转转。

那是平生头一回知道，自己生在博物馆日那天。好像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本人这一辈子，要花不少时间泡在别人收藏的旧物中间。这是没道理的事，自己这么多年，除了烟画，从没搜集过别的东西。倒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例行学工劳动，就是去给故宫扫地，除草一个月，从养心殿再到文渊阁，对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内部运作，建立起一点感性了解。

成年之后，开始有机会看世界。当时所谓的世界，指的就是欧美、日本。不过说起博物馆，更多还是聚集在西方中心城市。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学术水平的差异。这就导致一个旅行的问题。那些展馆分布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不会自动跑来找你。好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放了数字化资料库。但置身现场仍然重要；一些尺幅巨大的作品，更要身临其境。这就像看电影，去影院看大银幕和低头看手机播放，效果差别太大了。

早年家里有一本丹纳的《艺术哲学》，我对西方古典艺术的第一印象，就来自书中的插图。其中一幅，是题为《田园合奏》的16世纪威尼斯油画，作者注明是乔尔乔内，如果不是后来在卢浮宫看到原作，恐怕至今不会知道专家早已鉴定并给出结论，那是师出同门的提香的作品。

对于我们不在此间生活的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获得这些经验，是否是一件愉快并对自己有利的的事情？有利与否，其实是个价值的问题，而价值又往往被衡量高下，挂扣到鄙视链的各个环节。关于鄙视链，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不管爬到多高，只要你自己把自己套进其中任何一环，就已经落了俗套。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因为还不够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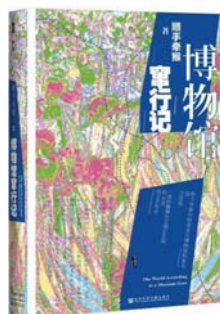
对未来弃权的人，会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往昔。博物馆就是供奉过去的庙堂。从希腊语词源看，博物馆的意思是九个缪斯的住处。按照神话的说法，她们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人的诸般技能，都是通过记忆积累的知识。在博物馆中，我们看到知识的早期形态，知识通过碑铭、简牍、泥版这些粗朴的记忆载体，逐渐积累。这就像原始形态的大数据。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数据”是外置型的，掌握在精英阶级手里，不论天官还是祭司。据说一些大人物自己不读书，家里的专职奴隶会把内容背下来，需要的时候叫来“检索”一下。我们将来面对的形势或许也差不多。人类数千年来习得的能力，像深度思维、内在性知识、工匠的技能，谁知道哪天就会一文不值。一个信奉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穷人，要想继续混下去，就得自我减负，弄清楚哪些东西自己不需要，然后忙点儿没用的。

作为普通人，能在世界上蹭到的福利十分有限，其中包括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己家休息室。博物馆也在其中。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剧场，派定的角色永不换人，好处是可以随便走动。你不用知道博物馆学，历史知识、风格分析也大都留给内行。万一知道了，就当有人憋不住打弹幕，提前剧透了。随着流动的故事把你代入另一次元，悲喜剧自动展开，所有主题终将归于普遍的人类处境——没有谁永远走运，可从没走过运的倒很常见。

走进大多数博物馆，里面的收藏都记载着人类经历的各种残暴历史，我们则万分幸运地赶上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这还只是文明的历史。那些自然博物馆则告诉你，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奇迹。我们脚下的大陆板块漂移不定，断裂、碰撞、隆起、塌陷，伴随着地震、冰川和海啸，还有一次的物种大灭绝。

（本文节选自《博物馆罪行记》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顺手牵猴著  
《博物馆罪行记》

## 【作家生活】

# 父亲老舍与济南的不解之缘

□舒济

父亲老舍在抗日战争初，只身流亡到武汉后，曾留恋地称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济南，他一住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里，他教书、写作，事业有成；收获了爱情、友情、师生情、父女情；生活幸福美满。那家家泉水，户户垂柳、世风质朴、社会安宁的环境令他由衷地喜爱济南。

我1933年9月出生于他的这个第二故乡。一年后随父母搬到了青岛。在青岛的三年里，我年幼淘气，膝盖永远涂着红药水，折腾得大人有时都“没了人样”。1937年，全家被卢沟桥的炮声震回了济南。这一年11月15日傍晚，外面突然传来震天动地的三声炮响。济南黄河大桥被炸了。巨大的爆炸震得家里的窗玻璃哗哗作响。那时我们住在齐鲁大学长柏路11号的灰色小楼里。我生平第

一次被吓得全身发抖，钻进了母亲的怀里。当晚，我依旧抱着母亲的双腿不肯离开。父亲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向我们告别，离开了幸福的小家投入抗日的洪流。1938年济南黄河大桥修复通车，母亲带着5岁的我、3岁的弟弟和1岁的妹妹回到了已沦陷的北平。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山东生活。

我对山东的儿时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对这段生活的再认识大都来自父亲的文章和母亲的回忆，以及我在“文革”后多次回山东的寻访和参观。李耀曦和周长风先生的《老舍和济南》一书也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使我得以全方位地了解父亲在济南的生活经历。

这本书以上世纪30年代为重点，以老舍先生的生活为核心，对济南的历史、地理、人文、习俗、教育等方面予以了生动细微的

介绍，可谓视角独特的济南文化断代史。这些史料有血有肉有笑有泪，十分生动，更可贵的是书中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

我和此书的两位作者已经交往了近四十年。在这些年里，我见证了他们坚持不懈地搜集和钻研老舍在济南的材料。没有他们的持之以恒，没有他们踏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本珍贵的史料难以面世。这是一部值得热爱老舍、热爱济南、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仔细阅读的好书。



济南出版社  
李耀曦 周长风  
《老舍与济南》 编者